

人与政治

HUMAN
AND
POLITICS

●朱文运 著

人与政治

朱文运

二〇〇八年三月

前 言

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社会……
最重要的是人与政治。

人创造了政治，政治又制约着人。

不问政治，不是明白人。
不懂政治，难于做人。

搞政治的有两种人：
正，是政治家；
邪，是政客。

政治家造福社会，
政客祸国殃民。

人类需要政治文明。

目 录

前言

政治是什么	(1)
中国是政治大国	(13)
战争与政治	(15)
民谣与政治	(24)
政治的两大学派	(33)
儒家学说是政治家的思想基础	(36)
政治谋略	(58)
法家学说是政客的衣钵	(65)
秦始皇的政治	(71)
学说与政治	(86)
政治阴谋	(90)
形而上学的政治	(99)

政治投机	(106)
江青的政治	(114)
愚民政治	(119)
革命与政治	(122)
政治关怀	(129)
政治文明	(134)
作者简况	(138)

政治是什么

政治，按现代汉语辞海的注解是：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国内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

政治，另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众人管理众人的事。

政治，政——正，治——治理。政治就是正确的、公正的治理。

众人管理众人的事，就是一种民主的办法，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却难于办到这一点。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了国家、国家往往是由帝王来掌管，他们出于私利，剥夺了人民大众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施蛰存的文章《人是政治的动物》中说：客问：亚里士多德（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人创造了政治。消极的看，政治影响着人，积极的看，政治要为人服务。人要通过政治，发挥人的组织能力，解决人与人的各种问题，从而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社会。

人是能生产物质，保证自身生存的劳动者；人是能管理好社会的管理者；人是有高等文化素质的有道德的社会成员。

人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人是能认识规律，适应规律和利用规律。

人是能创造客观世界，也能改造主观世界。

政治，从管理众人的意义出发，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

一是众人管理众人的事；

一是个人独管众人的事。

歌德说：“什么是最好的政府，那就是指导我们去治理我们自己（事情）的政府。”

众人管理众人的事，是众人的委托，是人民给予的权力，他的管理方法是民主，他是服务于大众的公仆，很辛苦，没有特权，使人不恋权，这些人后来成了政治家。

由个人管理众人的事，他的管理方法就是发号司令，一人说了算，有多余的产品物资时，就独占享受。有了特权，就恋权，想方设法夺取权力，而且要终身保持下去。人老了，就传子孙，家天下，形成独裁传统，这种人就是政客。

不幸的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国家就成了帝王统

治的工具。而且阶级社会历时又长，这就使得帝王的统治时间特长。在这种长时期的传染下，公正的政治少了，虚假的政治多了。

什么是政治？前面已经有所简述。

这里说的“政治”是另有一种含义，这是古今中外一些执政者常说的“政治”。这种政治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却含义深奥，不可直言，只可意会。

中国古代，有些皇帝怕大臣的功绩和权力过大，就重用身边的宦官牵制大臣，但又怕宦官得宠能量膨胀，又反过来利用大臣钳制宦官。大臣和宦官的能量在皇帝的心中都有一个底线，谁要越过这个底线，皇帝就要动杀机，如何运用宦官和大臣的互相牵制和掌握杀机，这就是皇帝的政治。

李斯原是吕不韦的门客，是吕不韦把他推荐给秦始皇的，应该说李斯后来的风光都是吕不韦给予的。但是，当吕不韦被贬回洛阳封地后，向秦王进言再令吕不韦迁往蜀地迫其自尽的，正是李斯。这就是政治。

赵匡胤披黄袍当了皇帝以后，立即“杯酒释兵权”，这是政治。

朱元璋起义由贫民当了皇帝，就把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删掉了，这是政治。

他杀尽功臣，斩草除根，为保儿孙坐稳江山，这也是政治。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成果，搞复辟当皇帝，把老百姓吃的元宵（袁消）下令改为汤元，这也是政治。

公元前221年的秦朝，中国大统一的时候，首创焚书之举，把

一切不利于秦皇统治的书籍都烧掉，烧了三十天。这是秦始皇为了政治的需要。

在二千多年后的苏联，也是在首创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大批焚书。

金雁的文章介绍说：1921年苏俄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曾讲过在得到政权、消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文章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大规模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俄中央委员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掩护”毒害人民的思想。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实”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毒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一千多万），宣传画223751份（二十多万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40多年后）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信息，完全是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消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

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须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能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炎黄春秋》2007.9 期）

为了政治的需要，斯大林规定“教科书”。金雁的文章介绍说：1934 年，当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该委员会还规定：不能把 1789 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 1917 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标准地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对于历史上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亚等并入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不能写成征服，而必须强调“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大家庭。对于党内的争论应该怎么写，规定尤其严格，对列宁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如此等等。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 30 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有人就因为提到了“30 年代的饥荒”这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炎黄春秋》2007 第 8 期）

斯大林把高尔基从国外接回来，目的是要高尔基为他写本自传。高尔基不愿意，感到在国内政治空气很沉闷，不自由，要求到国外去。斯大林不同意，高尔基在医院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送来一盒精致的巧克力。高尔基没在意吃了一颗，也给旁边的护士吃了一颗，两人便中毒而死。医生被关进监狱，成了凶手的替罪羊。这一切是什么？这就是“政治”。

尹彦的文章说：俄国在“1922年8月1日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1922年底完成数十万人的驱逐，驱逐与逃亡国外者达二百多万人，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1945年斯大林曾对罗斯福、丘吉尔说：‘经验证明，只有一个党才有利于国家安定。’”“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列宁说的‘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想越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行的，可惜好景不在，二十年代末期的农业集体化，又一次越过人民，使苏联又一联长期处于经济匮乏之中。”（《炎黄春秋》2007年11期）

何方的文章说：“政治上，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说：‘列宁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连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都能有这样一些反思，实在是难能可贵。”（《炎黄春秋》2007年11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抗

战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的胜利。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需要，都只讲自己的战果而贬低对方的战绩。因此多年来中国只有党史而没有国史。（中国不统一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国史）

可喜的是，时代在进步，人们在逐步排除政治的偏向，作出全面正确的认识。2005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新布展开放，就是很好的表现。统计表记载着抗战期间共歼灭日军154万余人，其中中共抗日军民歼灭日军17万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人，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万余人，国民党的贡献得到了如实反映。

“文革”初期，北京大学的聂之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参与写此大字报的7人中，有人发现聂之梓的动机不纯，有问题，就向中央文革写信反映。江青看信后，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说聂之梓有问题，不可靠，毛泽东说：问题的关键是她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政治。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逐渐被世人看清了，是为了解决与刘少奇矛盾。康有为的儿子康同壁曾激动地说：“我要写信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

这就是政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回忆录中，说到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动机时说：“我对此感到悲哀，（政府）在政治上不便承认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

度上与石油有关。”

现年81岁的格林斯潘认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对美国确保中东石油供应构成威胁。

英国和美国政府一直坚称，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与石油无关。布什曾说，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结束萨达姆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回避发动伊拉克战争与石油的关系，这就是他们的政治。

在这些执政者的口中，“政治”是个常用词，“为了政治”“这就是政治”。

政治成了借口，挡箭牌，或是一种手段。

政治成了目的的代名词，很漂亮的代名词，实则是掩盖了不可直言告人的目的。

不敢对人民直言者，是政治家还是政客？

中国地质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他的一生走的是“学者从政”之路。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北大教授、清华代理校长，后加入蒋介石政权10余年。他在63岁时说：“最可痛惜的是我未学政治，以不懂政治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常处于“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心理”，“尽管厌恶他们（国民党政府）的营私舞弊，说谎欺人，但模糊地还觉得他们代表了中国”（翁文灏《回顾往事》）

中央台放的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中，大特务俞沁斋的父母去世时，把他的小妹托咐给他，要他好好呵护小妹。不料小妹爱上了同学共产党员巩向光，在危难中掩护了恐，并决心要嫁给恐向光，这必然遭到俞沁斋的强烈反对，俞多次劝阻无效，最后

就派人把小妹枪杀了。当恐向光质问俞沁斋，为什么要杀小妹时，俞沁斋说：“这是政治！是党国的需要！”

胡风冤案，公安办案的人员有不同看法，认为算不上反革命案件，但《人民日报》已定了调是“反革命集团”，不好再说了。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用人是政治需要，不用人时就去掉。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说了他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等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事情，并把一份自我检查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陈毅安慰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4月2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使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直接制造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秦福荃《炎黄春秋》）

于是人们就看清了一种现象：

“政治从来不说实话。只有历史才能说出真话！”

“政治是不可能公正，只有历史才能公正。”

“政治是肮脏的。”

“政治总是落后于时代”。

“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整人”。

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斗争就是权力之争。

古时，庄子不愿当官，说：“当官不自由，身不由己”。

孔子说，乱世莫为官，为官莫说话，决不要整人。

孔子又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的有名大夫，经历过两代帝王。卫文公时政治清明，宁武子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办了许多好事。到了卫成公时，政治黑暗了，宁武子就装糊涂，不跟着办坏事。

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而拆腰。

清代的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就是跟孔子学的。

鲁迅同情被压迫剥削的平民百姓，他支持革命，但始终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毛泽东说，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这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了”，“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

鲁迅也弃医，但他不是从政，而是从文，他认为医只能医治人的身体，文却可以治人的灵魂。

毛泽东1941年1月给在莫斯科学习的两个儿子回信时说：“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每年赵丹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或者出差，经常应邀参加周恩来举办的舞会。一次晚会上，周恩来把赵丹请到身边谈心。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老要整他。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

对我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

又一年的中秋节，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赵丹到中南海西华厅他们自己的家里。赵丹说：“总理呀，你知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摘自《文化报·人物》）

窃国大盗袁世凯玩弄政治一生，落得个身败名裂，他在临终前，告戒他的子孙，要远离政治。

政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蒋介石在台湾的“反攻计划”因为美国因素而成为一句口号。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2000年的政党轮替，2005年的连战登陆。没人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台湾在清算蒋介石，而大陆却在重提蒋介石，政治，就是这么出乎意料。（《凤凰周刊》2008二期）

曾是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文革”中被江青拉过去。后来他沉痛地说：“若不卷入政治漩涡，我会是个好外交官。”

1979年，巴基斯坦的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被他越级提拔的，他的心腹齐亚·哈克送上了绞刑架。

政治就是这样无情。

泰国前总理他信结束了长达17个月的流亡生活，回国后表示，不再涉足政治。

为什么要评政？因为政是有关大众的事、切身利益，为政的好坏事关重大，所以民众要关心政事，评论政事。孔子讲诗的一个作用是“怨”而不是“颂”，就是强调要评政，而不是歌功颂德。为政者常听评政有好处，时时改进工作，社会就能进步，这是执政的工作、本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就够了，还何须“颂”呢？“英明”“万岁”歌功颂德多了会走向反面。